

VERSEAS COLLECTIONS
F CHINESE SCULPTURES
VER PA DYN



海外藏

中国历代雕塑

主 编 林树中
副主编 沈琍

上



江西美术出版社

●『十五』国家级重点图书

海外藏

上

中国历代雕塑

● 主编 林树中
副主编 沈琍

江西美术出版社

● 凡例

- 一、本书分上、中、下三卷，辑录了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精品 1380 余件，并附录：1840年后中国历代雕塑外流大事记、中国历代雕塑海外藏馆概览。
- 二、书中所录作品分为彩色图版、黑白图版、图录、附录四部分。彩色图版和黑白图版加注朝代、材质、尺寸，并附有图片内容说明，图录部分仅注明朝代、材质、尺寸。
- 三、本书所录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作品均按朝代顺序、材质分类编排。
- 四、书中所录作品尺寸，有少部分不明者不予注明。
- 五、本书所录作品创作时代，以朝代、纪年两种方式表明，有明确纪年的均以具体年代标明。

前言

•

中国历代外流的

雕塑及其艺术

● 上编

此编共分二章。第一章“缘起”，记述作者1985年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在参观堪萨斯市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时，看到从中国洛阳龙门石窟掠去的北魏《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痛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贫弱，饱受列强欺凌，导致国宝外流的耻辱，因而下决心要调查研究外流中国历代雕塑、绘画。第二章“使命感”，进一步阐明作为一个中国美术史学者，对调查研究外流雕塑、绘画具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There are two chapters in this part. In the first chapter, Origin, the author records and narrates that during his visiting professor in Michigan University, he visited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and saw a relief, Empress Wenzhao Holds Buddhist ceremony, in the Northern Wei (386-534) period, a plunder from Longmen Grotto, Luoyang, Henan,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Opium War in 1840 was the cause of the national treasure looted, because of which the nation became weaker in its power and lost ability to protect its cultural heritage. In Chapter II, Sense of Mission, the author elucidates his mission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o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outflow to overseas as a scholar of Chinese Art History.

一、缘起

我的手头至今还保留着一张照片，那是1985年9月在美国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参观时，助手卢素芬(密歇根大学研究生)在《文昭皇后礼佛图》前为我拍下有纪念性的留影(图1)，它勾起了我对20年前往事的回忆。河南洛阳宾阳洞中北魏雕塑《孝文帝礼佛图》(图2)、《文昭皇后礼佛图》(图3)是两幅著名的巨型浮雕(简称《帝后礼佛图》)，如同西汉霍去病墓葬的石雕《马踏匈奴》、唐太宗《昭陵六骏》石刻，都是历史的见证。

《帝后礼佛图》是近100多年来国耻的见证，也是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中国国宝的见证。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国家多难的时代，1934年美国大都会美术馆东方部主任普爱伦来华，曾去过洛阳，并拍下了宾阳洞中的雕塑《帝后礼佛图》照片，而

后找到北京琉璃厂彬记古董商岳彬，要他凿下运往美国。岳彬托洛阳古董商马龙图，联络当地保甲长和土匪凿下《帝后礼佛图》(成了几麻袋的碎片)，然后在北京拼凑组装运往美国。

1952年“三反”、“五反”中，在北京炭儿胡同彬记古玩铺内发现了彬记与普爱伦签订掠夺《帝后礼佛图》的合同^①。此事震怒了中国的文化界，300余位知名人士联名要求严惩奸商岳彬。岳彬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病死狱中)。

1973年我国首任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来到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参观时，提出要看该馆收藏的《文昭皇后礼佛图》。馆长的表情显得尴尬，指着上覆油布的雕塑说，很抱歉，正在修理，看不清楚。黄镇走上前去撩起油布，露出了半截雕像(《黄镇出使美国》，1995年10月28日上海《文汇报》)。作为



① 1985年9月林树中参观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
② 孝文帝礼佛图 [美]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
③ 文昭皇后礼佛图 [美] 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藏





- ④ 1906年斯坦因派遣护送人员押运文物至喀什的途中
 ⑤ 1909年载着文物资料的俄国奥登堡考察队的驼队
 ⑥ 1914年勒考克在运载文物的途中
 ⑦ 二战期间日本学者在北响堂石窟考察

上海美专的学生，饱经数十年的战乱和忧患的新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黄镇，他在看到这一国宝时，心里想到的又是什么呢？

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中国学者，只有在改革开放的路线指引下，才有可能到美国去讲学（任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在应堪萨斯大学华人教授李铸晋先生之邀到该大学讲学期间，我顺路到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参观。

当我站在这一浮雕前面的时候，往事如烟，心潮澎湃。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抢去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伦威德尔、法国的华尔纳、俄国的奥登堡、日本的“大谷探险队”等，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掠夺……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的脑海里映过（图4、图5、图6、图7）。国宝！国宝的流失！中国近百年的贫弱受欺凌的痛史！心中沉痛、愤慨的呼喊，促使我下决心要把这些都记录下来，立下档案，作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讨回国宝的依据。这就是我要编著《海外藏中国历代名

画》和《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等书的初衷。

中国境内沿丝绸之路的佛寺与石窟的分布，大致是西自新疆的托库孜萨拉依与图木休克佛寺、克孜尔石窟、七格星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山西的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直到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其中被外国掠夺最严重的是新疆地区，甘肃的敦煌，山西的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比之云冈尤甚），河南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是全国遭劫最严重的石窟之一，据查原有佛像近11万尊，但现今完整的不到十分之一。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笃信佛法的孝文帝迁都洛阳，皇室祈福造像中心由平城（今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移到洛阳。龙门北朝诸窟中，尤以宣武帝元恪为其父母孝文帝所造的宾阳中洞规模最大。从景明元年（500年）到正光四年（523年），其中尤以唯一最终完工的宾阳中洞造像艺术成就为最高。龙门石窟北朝造像遭劫掠也以此窟最为严重。仅宾阳中洞一处，造像遭凿毁即达60处，包括主像4尊、大型浮雕6幅，涉及人物造像达116身之多^②。

上文所提到的《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即分列在宾阳中洞洞门内侧的两侧。据我在20世纪60年代的考察笔记，《帝后礼佛图》居6幅大型浮雕两侧的中间。《文昭皇后礼佛图》的上面还有一幅《维摩诘变·维摩图》，与《孝文帝礼佛图》上面的《维摩诘变·文殊图》相对。两件作品下部还各有一图，分布有山水人物，似亦为经变，底部还有长鼻的神兽等（图8）。这就是王振国先生书中所指的“大型浮雕6幅”，但在6幅浮雕的原处，现仅剩累累凿痕了。除《帝后礼佛图》两幅浮雕现存

⑧ 宾阳中洞洞门内侧图

⑨ 佛手 [美]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



8



9

美国外，其他4幅皆不见收藏的记录，很可能是岳彬所主使的保甲、土匪等，在仓皇的盗凿行径中凿毁而未能恢复原状，因而永久被毁了。《维摩诘》浮雕是现存最早的《维摩诘》经变作品，与文献所载东晋顾恺之在建康(今南京)瓦官寺壁画《维摩诘》的时代最为接近。浮雕所刻维摩诘为一清俊飘逸的老头，随意地靠在“搢颐”(一种圆筒形柔软的靠垫)上，也与《历代名画记》所说的维摩诘为智者带有一点骄矜又有点病容的形象最为近似。此一浮雕是了解顾恺之《维摩诘》壁画的重要作品。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大都会美术馆普爱伦与古董商卢芹斋等勾结，除了从云冈、龙门盗去许多石雕佛像、佛头、浮雕外，还盗去了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右手掌。

卢舍那大佛窟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一处石窟。它已经成为龙门石窟的标志，游览过龙门石窟的人，无不对卢舍那大佛窟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这座相传以武则天捐献脂粉钱凿造的石窟，是大唐用国家公款建造的大窟，卢舍那大佛也是以武则天的形象为依据雕造的。总高度达17.4米的卢舍那大佛像，耳长1.9米，头部4米。大佛的右手掌长是0.52米(图9)，却为美国普爱伦勾结卢芹斋盗去。早先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中国雕塑，大多以等人高的佛像为主，然而像卢舍那那样的大佛，他们实在无法动手，却竟然把她的右手掌“斩去”！真是可恨之极。

如果说这些掠夺者和古董商对北魏《帝后礼佛图》凿成碎片组装是“粉身碎骨”，那么我国历代雕塑所遭浩劫还可归为以下几类：一是“斩首”，即凿盗佛头，此类最多。二是身首异处，如山西天龙山石窟第21窟唐窟，北壁原为一佛二菩萨，其西侧菩萨的头藏在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而菩萨的身躯却被藏在日本出光美术馆。三是全身搬走，这种例子很多，不必细说。而最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第四类，那些太大实在无法拿走的大佛，却被“斩手”。上面列举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像右手掌被“斩”就是一例。

至于龙门石窟扣人心弦的故事，还有古阳洞窟北魏高树龕佛像头、

火顶洞唐代左胁侍观音菩萨头像，被盗流落法国，再到比利时，又到美国，终经华人收藏家陈哲敬先生购得，然后回归祖国等等，多已见诸报端、电视台，本文后面还要细说。

注释：

①该合同如下：“立合同人，普爱伦、彬记。今普君买到石头平纹人围屏像19件，议定价洋14000元。至该约定之日为第一期，普君当即由彬记取走平像人头6件，作价洋4000元，该款彬记已收到。至第二期，彬记应交普君13件之头。如彬记能一次交齐，普君则再付彬记6000元。如是人头分两次而该6000元价款，亦分两期付交，每次3000元。至于全部平像身子，如彬记一次交齐，而普君再付彬记价款4000元。如是，该身仍分两次交齐，而此4000元价款，亦分两期，每期2000元。以上之货，统计价洋14000元。至于日后下存应交之货何年运下以及长短时间，不能规定。倘该三项日后发生意外，即特种情形不能起运，则该合同自行作废，不再有效。此乃双方同意，各无反悔，空口无凭，立此合同为证。此合同以5年为限，由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终止。此5年内，如不能将货运齐，该约到期作废。立合同人：普爱伦(签字)、彬记(签字)，民国二十三年国历十月一日立。合同各一纸。”

②王振国：《龙门流散雕塑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二、使命感

2001年2月，《文艺报》的《国宝》专栏主持人要我谈一谈近百年来中国重要文物的外流损毁事例和我在海外进行中国名画调查研究的感觉，免不了又引起深深的感慨。这使我想起了前些时在江苏有线电视台“地球村”节目的一次谈话。“地球村”，顾名思义，自然是谈大家关心的世界大事。我谈到了20世纪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与埃及、伊朗、印度等几个文明古国文物严重外流，每一件国宝的外流，其背后都有一个揪心的故事。主要内容还是说中国。

说到中国，就名画来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抢去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早期摹本)，1903年由英国约翰大尉卖给英国国家博物馆。就雕塑来说，1903年那次的放火打劫，还抢走了圆明园12个喷水兽头铜像。其后就是洛阳宾阳洞北魏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及唐《昭陵六骏》石刻二骏(其中两匹最精的)被盗。

而被盗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敦煌藏经洞约5万多种各类文物，其最精彩的绢画、纸画、经文等

被英、法、俄、日等国运走，至今分散在十几个国家，后来产生了世界的显学“敦煌学”。1985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参观，见到了华尔纳用最野蛮的手法——胶水与布粘走的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和一座精美的唐代供养菩萨塑像(图10)，还有在山西天龙山石窟藻井被挖走的一个个飞天浮雕。1987年我到山西天龙山石窟考察时，见窟内伤痕累累，几乎被盗挖一空。后来在2005年8月看了中央电视台4频道的《国宝档案》，又进一步了解到天龙山石窟的被盗，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学者”和山中商会肆无忌惮的劫掠。天龙山石窟雕刻的被劫，是近现代我国雕刻被掠夺的又一个典型事例。

关于敦煌学问题，近来有很多议论。有人说，尽管敦煌藏经洞文物是被连骗带抢掠走的，但这批文物在国外保存得很好，如果不是他们掠走，在国内，今日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呢；而国外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却使敦煌学显赫于世界。但今日的敦煌石窟还是好好的，甚至比以前更好。这与在敦煌掠去壁画和泥塑的美国华尔纳唱的是同一个调子。1924年华尔纳等人来到敦煌莫高窟，当他站在如此丰富辉煌的壁画和塑像前时，不觉看呆了。正是他发表了只有他们才是敦煌艺术真正保护者的谬论，好像当年如果没有他们的掠夺，今天敦煌就不可能存在了。根据华尔纳的记载，在抵达敦煌以前，还带了他的学生霍雷斯·杰尼，在甘肃泾川县王母庙石窟进行偷掘，掠走7个菩萨头像、一段异常精美的唐代菩萨残躯。前往居延海黑城子时，又盗走一尊彩塑佛像、几

方壁画^⑩。也有一些理论，说是以前我们国力贫弱受欺，但现在强大了，不必再搞什么民族主义，斤斤计较了。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文物以及丝绸之路上新疆诸石窟壁画、雕塑等的被掠夺，是由于当时我国处在落后状态，帝国主义列强的“学者”进入这些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没有文物保护法，要什么拿什么，这有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这些学者在敦煌学等方面的确也做出很多成绩，不必一笔加以勾销。2002年我到欧洲法、德等国调查考察(图11)，见到陈列的中国绘画、雕塑确是保存得很好。可惜被掠到德国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部分被炸毁了。

历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60年英法联军的火烧圆明园；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日本的投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与美国侵略军的拼刺刀，又到尼克松访华；从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提出，到今天的神舟6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轨道，中国正在一天天地走向由弱转强、由贫到富的道路。

现在欧美博物馆、美术馆的领导和研究班子，已经不再是纳尔逊·艾克斯昔日的馆长席克门等；该馆的东方部主任已换成美籍华人何惠鉴。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馆长罗潭，在我到该馆参观调查时，亲自与该馆的东方部主任、华人傅申陪同接待，要看什么就拿什么，尽管这些艺术品都是国宝级的。傅申现已被调回台湾担任台湾大学教授，他的学生张子宁接任了弗利尔美术馆东方部主任。华人学者武佩圣现在已当上了密歇根大学美术馆馆长。2004年11月在沈阳庆祝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建成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与这些朋友相聚一堂，共同讨论，亲如一家人。

这里还要提一下作为前辈的何惠鉴先生。他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学生、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曾先后任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馆长和纳尔逊·艾克斯美术馆的东方部主任，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2004年沈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已是85岁的高龄，还拄着拐杖上台发表

⑩ 供养菩萨像 [美] 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

⑪ 2002年林树中(右)与法籍华人张先生在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





⑫ 罗汉像 [美]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

《〈洛神赋图〉是顾恺之的作品吗?》这样有特殊见解的论文。1985年我到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参观调查时,承他热情接待,陪我到仓库里查阅资料,要看什么,就随手拿来观摩。中午由他请客吃饭,临别时还赠送该馆出版的图录等书。正是有何先生这样的华人以及美籍、英籍等友人的鼎力帮助,我才有可能编出《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和《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这样巨型的著作。据悉,何先生2005年春天还到上海与上海博物馆联系中美交流展览事宜,不幸因过于劳累,心脏病突发病故于上海。谨在这里对何老表示深深的悼念。

至于多次被评为“世界第一”的哈佛大学,曾一度被视为当年掠夺中国文物中心之一,这里培养了赛克斯、史道特、华尔纳(粘走敦煌壁画、掠走菩萨塑像者),还有华尔纳的学生霍尼斯、杰尼、普爱伦[参与盗掠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浮雕、云冈石窟北魏佛首、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右手掌、易县八佛洼辽代三彩釉陶罗汉(图12)、大量殷周铜器、明清官窑瓷器等]。华尔纳的另一个学生席克门于1930—1934年来中国,从北京智化寺万佛阁拆走明代的藻井,从山西广胜寺盗走元代壁画,把它们组成一个“中国庙宇式”的大厅(此为我1985年到美所亲见,而且大厅还摆设一个宋代木雕观音坐像)^②。然而哈佛大学也培养了我国现代考古学的第一代学

者李济博士,他是殷墟发掘的主要参加者。再就是培养了新一代考古、美术考古的学者张光直和巫鸿等。

对于以上这些单位、人物和问题,今天要历史地来看,要一分为二来看。像华尔纳,他既有罪行,又有言论,尽管已成历史,有当时的客观因素,还应定为“掠夺者”。日本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也应定为掠夺中国文物的奸商。但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却不必声嘶力竭地举起拳头喊口号,大加申斥。正如令人尊敬的前辈季羨林教授说过:“敦煌是属于世界的,但首先是中国的。”

关于讨回国宝的问题。前些时候中国美术学院前院长肖锋教授来信谈到要我协同并提供有关国宝外流的资料,准备在“两会”期间提出议案,讨回国宝。这也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了。我曾提出呼吁,并且在美国、法国等国家得到很多华人的响应,有的还成立了“讨回国宝委员会”这类民间组织,并希望我到日本东京去参加他们的会议。讨回国宝,特别是敦煌藏经洞这批文物,季羨林、宿白教授等早已呼吁过,国家文物局马自树副局长也发表过谈话。最近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来南京,畅谈了他在国外调查国宝外流的情况,并接受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这个头衔,在南京传为美谈。可见报效国家、调查研究外流国宝、呼吁收回国宝之心,人所共有。问题是还要有理有节,尽量做到有法可依,充分运用国际文物回归的有关法律^③。

注释:

① 普爱伦:《纽约市艺术博物馆所藏中国雕塑》1944年。

② 《揭露美帝国主义一贯掠夺我国文物的无耻罪行》,载《文物》1960年第4期。

③ 本节文字曾刊《文艺报》2001年2月3日,此次作较多增订。

●中编

此编共分三章。第三章“‘丝绸之路’新疆地区外来宗教的输入与雕塑”，叙述“丝绸之路”的古西域(今新疆地区)佛教、袄教等及其造像的输入。本章着重欧洲及英、法、德等国 20 世纪早期对新疆地区宗教雕塑的掠夺收藏。第四章“新疆宗教雕塑与中外文化交流”，说明犍陀罗艺术、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及粟特文化等与中国文化的交流。第五章“《昭陵六骏》中二骏外流与陵墓雕塑艺术”，从《昭陵六骏》二骏的外流，谈到历代陵墓雕塑的外流及其艺术。

There are three chapters in this part. Chapter Three is the Adoption of Exotic Religion in the District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its Sculptures, in which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adoption of Buddhism and Zoroastrianism and their modelings in ancient Western Regions (Sinkiang).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outflow of religion sculptures, in Sinkiang district, collected mainly by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like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20th century. Chapter Four, Religion Sculptures of Sinkiang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Home and Abroad, illuminates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andhara,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Persia, Sute, etc. In the Chapter Five, the Outflow of Two relief Pieces of the Six Coursers in Zhaoling and Tomb Sculptures, the author expatiates on the outflow of two relief pieces and tomb sculptures in history.

三、“丝绸之路”新疆地区外来宗教的输入与雕塑

1. 外来宗教输入西域

古代所称“西域”，泛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主要属今新疆。《汉书·地理志》说，西域，西汉武帝时始通，本三十六国，以后增到五十六国。从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来看，正处在“亚洲腹地”，成为丝绸之路的中间枢纽。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13年，到过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并看到已有从四川输入的蜀布和邛竹杖。东汉班超于永平十六年(73年)以司马出使于阗(今和田)，率军驻守西域。汉军曾驻守疏勒(今喀什)城郊。到魏晋时期与内地的来往逐渐频繁。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目前还有争论。传入时间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两汉之交；传播路线之争，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的“滇缅道”三条。我主张早期佛教传入路线的多元说，即佛教是同时从这三条路线传入中国^①。

佛教传入古西域新疆的时间也有争论。新疆学者孟凡人编著的《新疆古代雕塑辑佚》^②，谈到根据《汉书·西域传》、《洛阳伽蓝记》、《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等以及新疆残存的佛教遗迹推断，佛教首先传入“西域南道”的于阗(今和田)地区，似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前后，而佛教在西域南道普遍流行，恐怕要到公元3世纪左右了。至于佛教传入高昌(今吐鲁番地区)，从吐峪沟石窟寺发现西晋元康六年(296年)竺法护译《诸佛要集经》残件以及该石窟寺有些洞窟开凿于高昌郡时代(327—

442年)或在此之前来看，佛教正式传入高昌地区可能在3世纪后半叶左右。

金维诺、罗世平著《中国宗教美术史》，认为印度阿育王弘传佛教，《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有龟兹国名。如传说可信，则龟兹于阿输迦王时已与印度有所接触。但汉代有关西域的记载，却从未提到新疆当时奉行佛教，新疆发掘的两汉遗址也不见有佛教寺院及有关遗迹。有人认为是东汉顺帝阳嘉至永和(132—141年)间，中原地区困于羌乱，无暇顾及西域。笃信佛教的大月氏势力，由沙车、疏勒进入于阗，佛教的传入也当在此时^③。

2. 进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外国“探险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到强盛阶段，而我们的祖国却衰落已极。回顾一下100多年来丝绸之路的考古史，可以明显看到西方列强的“学者”仗其经济、文化的优势进入这条古道，如入无人之境，肆意掠夺。

就丝绸之路新疆地区外流雕塑来说，最早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是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他于1895年进入我国新疆。第二个进入新疆的是匈牙利人(后入英国籍)奥利尔·斯坦因，他于1900年5月开始了对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3次考古搜索行程(图13、图14)。斯坦因在中国共掠去大小文物5万余件，其中主要取自新疆。紧跟着斯坦因的是德国人艾伯特·格伦威德尔、艾伯特·勒考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他们先后进行了四次掠夺，涉及的范围西至克孜尔石窟，东至吐鲁番地区(图15、图16)，其掠夺的雕塑作品主要收藏

⑬ 1901年斯坦因的考察队在尼雅遗址
⑭ 1901年斯坦因与随员在和阗考察途中





15 1905年艾伯特·勒考克在沙乌特客栈

16 1914年格伦威德尔与勒考克等第三次在新疆地区进行考察

17 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18 佛头像 [日]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在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

伯希和(paul pelliot), 法国人。他1906年在喀什、巴楚托库孜萨拉依, 1907年在拜城克孜尔石窟寺、库车的库木吐拉石窟寺、苏巴什佛寺遗址、新和的杜勒杜尔—阿库尔佛寺遗址等处, 劫走了大量雕塑艺术品(图17)。运回法国后, 主要收藏在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

日本大谷探险队, 1902—1904年, 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和田的约特干及其附近诸遗址以及阿克苏、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调查。1908—1909年, 野村荣三郎、桔瑞超在吐鲁番、焉耆、楼兰、米兰、尼雅、和田、库车和图木休克等地调查。1911—1914年, 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先后在楼兰、和田、吐鲁番等地调查发掘。日本大谷探险队通过上述活动亦劫掠很多雕塑艺术品。这些雕塑艺术品, 少量存放在旅顺博物馆和韩国国立博物馆, 绝大部分运回日本。

3.“西域”南道的宗教雕塑 古称“西域南道”的走廊地带,



分布着于阗、鄯善两个大国和一些小国。这条路线与汉代开通西域的道路有着直接的联系, 魏晋时期的西域都护史即设于此。其出土的代表作品有:

楼兰古城出土的有LB第五寺遗址的浅浮雕佛像(木雕佛像)等, 制作于公元3—4世纪, 是新疆现知最早的佛像遗存之一。

拉瓦克佛寺遗址(在和田东北, 属古于阗国)发现80余躯等身立像, 头毁, 身躯硕伟, 全身比例解剖恰当, 薄衣贴体, 衣纹密集, 呈平行细线。另一种为模制焰肩佛坐像, 说明这些佛像受波斯祆教的影响。

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 室内狮子方座与犍陀罗形制相似。天王像着波斯式铠甲, 下踏螺发人物的毗沙门天王, 却是西域特有形象。

约特干遗址(多数学者认为是于阗国都所在)出土有: 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的两件圆雕铜鎏金铜佛头(图18), 时代一说定为3世纪上下, 一说定为4—5世纪; 瑞典斯文·赫定收集的一件浮雕小铜佛像、一件玉雕四臂孔雀明王像。



19 佛教故事群像 [法] 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藏

20 2002年8月林树中(左3)率代表团在欧洲考察

21 天部头像 [德] 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以上除日本、瑞典人所收集者外,大都为斯坦因所掠,现藏英国国家博物馆。

1959年在民丰县以北发掘了一座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蜡染棉织品,下部边饰上有龙纹;中部残,留有人脚、狮爪和狮尾;画的右下角画一半身女像,头有项光,胸裸佩璎珞,双手捧一下尖上圆的容器,其中满盛葡萄。金维诺教授认为这是一幅时代明确属于汉代末期的佛画。残留人脚即为佛像,女像即为供养人像。也有人提出此女像手捧容器,内装葡萄,是属于波斯的祆教画。这实际上已经是波斯化了的佛画,却又画上中原特色的龙。它是东汉时期这一地区既具有印度佛教色彩,又是波斯化了的并带有中原汉文化特色的艺术品,表现了该时代该地区的宗教画特色。

4.“西域北道”巴楚的佛教雕塑

天山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走廊地带,古称“西域北道”。其西以龟兹国为中心,东以焉耆国为中心。佛教以小乘教为主,大乘教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条路线石窟连接,最西有喀什附近的三仙洞石窟,但遗存壁画已是唐代及以后所作,未见雕塑作品记录。

托库孜萨拉依与图木休克佛寺遗址,该遗址在西域北道最西端的巴楚县,属龟兹国。托库孜萨拉依遗址由法国伯希和发掘,出土大量泥塑圆雕和高浮雕像,仅佛头就有128件,还有与和田地区相近的兽面以及少量木雕像。

该遗址第一建筑群以佛塔为中心,两侧有多间小佛殿,有供养人立像及佛头、菩萨头、供养人头像。塑像风格明显受犍陀罗影响;但一些塑像面部较丰满,眼鼻略向中间集中,又有西域本地塑像的特点,时代约为3—4世纪。第三建筑群发现有立佛像、坐像,残毁严重。壁间绘有中原式童子、背光光轮和鸟的形象有明显波斯影响。此遗址出土有唐开元通宝,其时代下限可晚到8世纪以后。第二建筑群在残存三壁殿外分铺连续塑高浮雕佛传故事,尤为精彩,这是新疆仅见的高浮雕佛教故事塑像(图19)。图上中间端坐的佛与上面两个飞天都长有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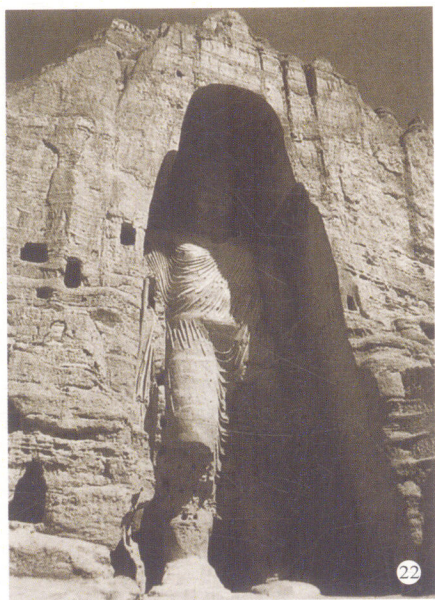
以此和东西丝绸之路之上诸佛教遗址比较,如印度阿旃陀石窟、伊朗斜依布石室、阿富汗巴米羊石窟以及往东的克孜尔石窟的链接,可以明显看出西来佛教艺术的传承。

5.拜城的佛教雕塑

克孜尔石窟雕塑: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境内丝绸之路上开凿最早(约在3世纪)、延续时间最长(下限可达13世纪)的石窟之一。1983年,我曾带研究生到此待了一段时间,2002年又率代表团到欧洲调查外流的中国名画和雕塑(图20),在德国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看到由勒考克掠走的此石窟雕塑,印象甚深(图21)。这里发现的古代雕塑,虽然数量不算多而且缺少早期作品,但是很有特色。一些菩萨头像(其年代据推测为6—7世纪,有的要到8世纪)的民族化、民俗化的面目已很清楚。如第三区最终窟佛涅槃群像中的一个头像,基调是用中原画塑结合的手法,而头发的处理是希腊式的,面相是龟兹型的。面部比较平而光滑,涂白色相粉,墨线描眉毛与眼眶,用墨色点眼珠,面部其余线条均用红褐色。“点睛”的手法,活泼生动而传神,这是中原传统绘画的手法,有的学者称之为“西域式”与“龟兹式”。而二区四窟所出的妇人像(人首兽身像)发式、脸型很像中原汉人,其下却以象头为胸部,用象脚作底座。据称与西域南道尼雅和楼兰地区出土的人头兽足木雕一样,有希腊罗马古典艺术的因素,可称“中西合璧”了。又立佛泥塑,其体型和衣纹处理是“曹衣出水”的代表作之一。此石窟还出土一些小型木雕像,题材以佛、菩萨、天部为主,有的薄衣透体,或衣褶浅平,具印度造像风格。这些造像也可与中原的佛像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两个“伎乐像”,一拍腰鼓,一弹竖琴,却又像中原的泥俑与石窟中的雕刻。克孜尔石窟的雕塑上继托库孜萨拉依、图木休克的雕塑,是“西域北道”雕塑的代表作。这些雕塑结合壁画,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龟兹艺术”。

杜勒杜尔—阿库尔佛寺遗址的雕塑:遗址在库车、新和交界处,隔渭干河与库木吐拉石窟相望。多数学者认为是龟兹著名的阿奢理貳

22 阿富汗巴西肯大佛
23 佛坐像 [英] 国家博物馆藏



式伽蓝。所出主要是泥塑和小木雕像。其发式多为希腊式，鼻眼较小、较平，又是“西域式”。色彩丰富，有的贴金，颇为精彩。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陈列即达20件以上。遗址出土开元通宝、大历通宝、建中通宝以及汉文佛经及文书，可知受中原唐文化影响显著。

库木吐拉石窟雕塑：此处石窟是龟兹国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住持最多的石窟。1983年我到此调查时，印象是其全部壁画色调皆以赭红色为主，艺术形式与敦煌唐窟壁画甚为相似。所出泥塑、陶塑、石雕、铜像和木雕种类齐全，唯数量较少。泥塑方面，大像无存，仅在“第五大洞”见一尊造像石芯、一佛像身，全身作汉式的图案，是汉式彩绘。两个“天部像”涂以黑发，脸型也是汉人。一些供养人，其鬓发、脸型也全是中原汉人。此石窟是龟兹石窟中中原汉文化表现的典型窟。

6. 关于大像窟

克孜尔石窟内的大像窟，前室高敞，正壁雕塑大立佛。据统计，现存7个大像窟，如47窟、48窟、77窟等。其中规模最大、年代较早的为第47窟。该窟主室券拱高18米，宽7.6米，中心线两侧各有凿孔。原像为泥塑，推测高度在15米以上。以大立佛为主尊，两侧塑十方佛。后室涅槃，台上有大型涅槃塑像。第47窟的碳14测定年代为 350 ± 60 年，大致与鸠摩罗什在龟兹弘扬大乘佛教的年代(359—385年)相合，两者当有关联。惜大像皆已崩毁。在克孜尔石窟期间，该窟工作人员曾谈到发现新窟中曾存有一巨大横卧涅槃佛像，极完整。但仅数分钟，像便轰然一声粉碎。可能是长期密闭状态突然接触空气之故。

龟兹地区的石窟一般都凿有大像窟，克孜尔石窟以外，还有库木吐喇石窟、森木赛姆石窟等。其立佛的高度约在10—15米上下，亦作泥塑，并皆毁坏。

克孜尔石窟的大立佛，往西可与今阿富汗的东西两大佛链接。两大佛分别高38米和53米，是丝绸之路西段重要遗迹(图22)，惜已为塔利班军队炸毁。二大佛的开凿年代一般认为较克孜尔石窟大佛为早

或同时。近年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凿造于6世纪，那么克孜尔石窟的大佛有可能向西传向阿富汗，向东又传向甘肃的炳灵寺和山西云冈的大立佛。在“丝绸之路”的古道上，以大立佛为标志的东西相传之迹，风采依旧，赫然在目。

7. 七格星佛寺遗址的雕塑

七格星佛寺遗址和石窟雕塑在焉耆县城西南约30公里。时代在3—11世纪左右，盛期在7—8世纪(唐代)，属焉耆国，是古焉耆国的典型石窟，发现塑像较多。塑像头发多呈键陀罗或印度式，衣褶有“曹衣出水”特点。皆标准像，装饰和铠甲武士有明显波斯影响，尤以焉耆明屋佛寺所出完整而典型，膝部衣饰塑出圆褶，是焉耆塑像独有的风格(图23)。制作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模制像较多，有同一地方的塑像早于壁画时代的现象；二、接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彩塑多于库车地区，具有唐代中原风格，与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唐塑菩萨像极为相似。《菩萨像》与焉耆明屋佛寺遗址出土泥塑《武士像》和《贴金佛坐像背光》亦有典型意义。《武士像》着波斯铠甲，是“波斯影响”的典型。

8. 高昌地区的雕塑

吐鲁番盆地古称高昌。唐代以前的佛像罕有发现，入唐后，佛教泥塑、坟墓泥俑增多。所谓“唐代雕塑风格”，主要是指塑绘结合，形态上脸型较圆，眼细长，鼻柔和优雅，口较小。少数可以看到键陀罗、印度的影响。其次是在汉族墓葬中，大量出土木、泥俑。其形制、风格与唐俑关系极深，简直像是从中原移植而来，但也不乏西域的地区特点。

注释：

① 林树中：《早期佛教输入中国的路线与民族化、民俗化》，载《朵云》(60)，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孟凡人：《新疆古代雕塑辑佚》，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



24



25



26

24 佛教故事群像 [法] 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藏

25 天部立像 [德] 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26 佛坐像 [德] 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四、新疆宗教雕塑与中外文化交流

1. 调查研究新疆宗教雕塑的必要性

新疆地区处在丝绸之路的中枢,东西方交往远比汉通西域的文献记载要早得多。按照最新的理论,人类从非洲产生,走出非洲以达整个地球的各大洲。从新疆、甘肃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考察,当时东西文化即已开始发生碰撞。贵霜文化(犍陀罗文化)、古典西方文化(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安息文化)、中亚其他文化(粟特文化等),以及埃及文化、东方的汉文化和草原文化(本土文化),错综复杂,这就是“西域美术”也是“西域雕塑”产生的历史背景。

根据1983年我带研究生到丝绸之路新疆诸石窟调查的情况,各石窟壁画遗存尽管也受到列强的掠夺,数量尚相当可观,基本保留原貌,但雕塑则几乎荡然无存。20世纪初期列强学者的盗掘,基本上把埋藏在地下寺院遗址及石窟的雕塑却掠一空,因而要研究古西域(新疆)的雕塑,特别是佛教雕塑,只有凭借流落西方的这批实物了。2002年我带沈琍博士等人到欧洲,才在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德国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等处见到这批被劫掠的雕塑(图24、图25)。当时被震慑的程度,不低于往昔在美国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见到龙门石窟北魏《文昭皇后礼佛图》时的情形。使我感到第二个震慑的是它所受外来艺术影响的强烈和作为“西域美术”本身的特色。

要研究我国境内丝绸之路诸石窟与寺庙的佛教艺术,雕塑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与壁画及其他艺术品可以互补,这样才可以全面地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

2. 犍陀罗艺术

在古印度,犍陀罗与秣菟罗是迦腻色伽王(约78—144年)统治时期佛教造像的两大中心。犍陀罗古国是印度西北的佛教中心。这个地区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入侵(公元前326年)后,即为希腊人所占

有。犍陀罗的工匠们沿用希腊雕造手法雕造大量佛像。造像地主要在犍陀罗古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临近的阿富汗东部一带),故名犍陀罗艺术。犍陀罗造像的主要特点是形象写实性强。面部明显具有欧洲人特征:波浪型头发,深目高鼻,眼睑细长,丰颊薄唇。头部肉髻多采用束发式。着希腊罗马式披袍,佛之天衣通肩缠绕,或袒右肩,跣足,衣服紧贴身体,衣纹堆叠有厚重质感,稠密而有规律。佛与菩萨有项光,项光作平板圆形。雕刻的材料主要是青灰色云母片岩,显得凝重肃穆。犍陀罗的雕刻艺术是由希腊的艺术和印度佛教艺术融合而成。将西域雕塑与今存印度犍陀罗佛像进行比较,托库孜萨拉依佛寺遗址(西域北道)出土的佛像木雕、米兰第二寺遗址出土的佛头像、图木休克东寺遗址出土的天部像泥塑、克孜尔石窟柱窟出土的木雕佛坐像、七格星石窟寺麒麟窟的泥塑佛像(图26)、七格星石窟寺星宿窟出土的泥塑佛像都属于此一类型。到4世纪印度文艺复兴时期,笈多式雕刻则发生变化,佛像发式被雕成螺旋形,面貌不像欧洲人而成为印度人的理想型。菩萨像多上裸下跣,腰间到膝围有裙裾,璎珞华丽,衣服纤薄贴体,充分表现了肉体的美,衣褶变为浅平行线,完全从属于形体的变化。只是这些佛像雕塑,因新疆缺少石材,改为泥塑和木雕为主。

3. 古典西方式(希腊、罗马式)艺术

上文提到印度佛教犍陀罗艺术受到希腊的影响,但它与古典西方式(希腊、罗马式)艺术还是有区别的。这里所说的佛像雕塑形式,也可称之为正宗的希腊罗马式。1996—1998年我在主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时,接触到“西域南道”若羌米兰佛寺遗址出土的壁画时,惊异于这些壁画上出现的神和人的形象,巨目、隆鼻、肤色白,背上长出双翼,简直像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壁画照搬过来的。从而推论这些壁画的作者,不是希腊、罗马人,也应该是欧洲人。近年来新疆的考古证实远在3000年前就有欧洲人在这里活动。在公元4世纪(魏晋时期)有欧洲的

画家、雕塑家在这里进行艺术活动是不奇怪的。考古学家已从克孜尔石窟找出来自叙利亚的画家所画的壁画，上面有画家签名。2001—2005年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报道并证实了距今2000年前曾有一支罗马军团来到中国，在今甘肃永昌县者来塞定居并繁衍后代。

这种在新疆发现的古希腊罗马式的雕塑可以“西域北道”托库孜萨拉依佛寺遗址泥塑佛头像为代表。

托库孜萨拉依与图木休克佛寺二处遗址在“西域北道”的最前部位于巴楚县和西域丝绸之路的最西端喀什，被认为是“西域北道”西端最重要的佛教遗迹，属龟兹文化范畴，其出土的雕塑因之也具有重要意义。托库孜萨拉依佛寺遗址由伯希和发掘，出土大量泥塑圆雕和高浮雕像，仅佛头就有128件，其中多件现在在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陈列(图27)。还有与和田地区相近的兽面以及少量木雕像。

这些雕塑的时代从3—7世纪，相当于魏晋南北朝到唐前期。上举数例即为古希腊罗马式的典型。托库孜萨拉依佛寺B殿残存壁上尚存佛教故事浮雕，是新疆地区唯一的高浮雕遗存，具浓重的古希腊罗马式风格。如后数第4铺，中间塑菩萨坐像，两侧塑孔雀羽毛，上面两侧各塑一身飞天，飞天有翼，菩萨宝冠上有一对鸱卧于巢中，这些都明显具有西方古典艺术的因素。又附近图木休克佛寺遗址的佛塔之西殿中的佛像中，从其中一件跪坐合掌像也可窥见古希腊罗马艺术的身影。

4. 波斯文化与祆教

根据先辈张星烺、夏鼐先生的研究成果，波斯在安息王朝(公元前248—公元227年)即与我国发生交往，5世纪下半叶到6世纪初，波斯遣使中国就达10次之多，但直至北魏，史书始见“波斯”一名。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其背面是祆教(拜火教)祭坛，拜火教是该国国教(波斯萨珊王朝自222年建国后，国势强盛)。河南陕县隋墓也出土波斯银币，又广东英德县南齐墓也发现3枚波斯银币。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陆、海两路，波斯与中国的交往是很频繁的。^①欧洲

人有一种说法，说是伊斯兰充当掎客，促成西方和远东之间的贸易。因为波斯等伊斯兰国家地处欧洲希腊、罗马和中国之间的缘故。

据金申先生并引孙机先生的文章^②，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金铜燃肩佛坐像(图28)，被公认是十六国时期(约350年前后)的，发现于河北石家庄。其制作地很可能是古西域的新疆地区，由西域僧人携入。佛像面相带有伊朗系人种特征，着通肩式大衣，双手作禅定印，趺坐于方台座。两侧两狮子，双肩上各生有如锯齿状四股火焰纹。燃肩(也作焰肩)与波斯人崇信拜火的祆教有直接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墓里发现的佛像画，一个是身后有项光的童子，另一个为两肩各有4束火焰的佛像。这种焰肩佛像正是“波斯化”了的佛像形象。这说明当时佛教初传中国不久，画工对佛教艺术只是一知半解，偶有所见便觉时髦，采入画像之中。又沂南汉墓石刻《大维图》中驱鬼傩像，一些肩上冒出状似翼翅的火焰，其实也是焰肩，是受波斯祆教的影响。

在迦毕试(今阿富汗的贝格拉姆)出土的舍卫城石雕像神变(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藏)为肩上出火。可见燃肩佛是古迦毕试佛教受祆教影响最早创造出的样式，在贝格拉姆古城附近派特瓦寺院遗址出土的双肩各带四束火焰纹的石雕禅定佛坐像(时代约为3世纪)与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所藏佛像极为相似。此后这种燃肩佛随法东传，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第207窟、吐鲁番的拜西哈尔石窟第3窟和鄯善的吐峪沟石窟壁画都画有燃肩佛像壁画。佛像雕刻出现火焰纹的还有克孜尔窟孔雀窟的木雕佛像(6—7世纪作)。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的石刻，据发掘报告，考为东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之际，此处佛像与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出现的东汉末佛像石刻地点相近，当是属于海上输入的佛像线路。

5. 粟特文化与曹仲达

在谈到古西域的宗教输入时，一些论著大多未曾提到粟特文化。直到1999年10月在山西太原发现

27 菩萨头像 [法] 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藏
28 佛坐像 [美] 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

